

# 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 (II)： 戰後的變動與挑戰 (1945–1949)

湯梅英 \*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教授

## 摘要

本文是〈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系列的第二篇。此系列主要探究台灣經歷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國家認同、政治權力、本土和中國以及全球化等不同勢力競逐下，學校教育如何形塑、建構「公民」意識，藉此爬梳台灣面對殖民主義、國族主義、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教育體制推動公民教育的內涵與轉變歷程。這篇文章延續〈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 (I)〉的討論架構，以教育措施、課程與教學活動及教育成效三方面，分析二戰後至國府遷台 (1945–1949) 的歷史階段，藉此理解公民教育的發展歷程。

台灣在戰後四年藉由教育政策與制度的中國化，建構「中國化」的教育系統，透過精神國防式的師範學校，培養效忠國家的教師，以實際推動中國化教育，傳遞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為消除日本殖民的皇民意識，確保臺灣人對中國的認同，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特別重視國語文、歷史及三民主義等科目，增加教學時數，辦理各項「國語」推廣活動，以培養具有中華文化思想與國族精神的中華民國國民。換言之，戰後轉換期台灣的「公民」教育，以「中國化」為推動與改革教育制度的準則，強調去除日本殖民色彩，加強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傳遞國族意識，培養效忠國家民族的「公民」。

## 關鍵字

公民教育、國家認同、中國化教育

---

\* 電子郵件信箱：mying@utapei.edu.tw

## 前言

本文是〈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系列的第二篇，此系列主要探究台灣經歷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國家認同、政治權力、本土和中國以及全球意識等不同勢力競逐下，學校教育如何形塑、建構「公民」意識，藉此爬梳台灣面對殖民主義、國族主義、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教育體制推動公民教育的內涵與轉變歷程。

前文〈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I）〉<sup>1</sup>討論台灣在日本殖民（1895–1945）時期，引進西方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以及西方現代文明影響的脈絡下，國家介入原本以私人興學為主的的教育領域，建立國家掌控的現代教育體制。由於殖民初期台灣各地激烈抗爭，日本採高壓手段武力鎮壓，之後總督府改以懷柔政策，採取逐步的同化方針，並高唱「日台一體」，即台灣人與日人一樣皆屬天皇子民。雖然，實際上並無改變台灣作為二等國民的差別待遇，但為了同化、統合台灣人，總督府積極推動現代化、普及的教育制度。透過各種教育措施、課程與教學活動，尤其重視國（日）語和修身等科目，灌輸宗主國的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企圖改變台灣社會原有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加強對日本殖民的認同，培養台灣人成為效忠天皇的國民。簡言之，日本在台灣實施殖民同化的教育政策，殖民政府定義的「公民」即是天皇子民，普及化的學校教育及日語推廣皆是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以塑造效忠天皇的臣民、愛國的順民。由於日本殖民主義所建立的教育制度，蘊涵現代化與殖民同化兩種意義，引發象徵光明、進步的現代化，以及黑暗、壓迫的殖民統治截然不同的觀點，進而影響教育成效的評估。然而，此種兩極對立的評論，往往忽略台灣社會原本存在不同族群、階級和性別等因素所造成生活經驗的差異，教育制度中個體的主體意識與能動性，以及潛藏其中的權力競逐與國族認同的矛盾，愛恨交織、複雜多樣的殖民經驗。

這篇文章接續探討台灣戰後到國民政府遷台（1945–1949），短短四年政治轉換期間的教育措施。在日本殖民結束後，台灣人不但目睹戰後的蕭條、民

1 請參見湯梅英（2014：19–30）。

生凋蔽，並且經歷送走日本迎來國民政府，政權轉移的混亂，引發國族認同和社會失序的問題。究竟是重回「母國」懷抱，還是受到另一種「殖民」壓迫？至今，常因論者背景、立場各異而有不同的詮釋。1949年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的大動盪，歷經白色恐怖的五、六〇年代，以及國際政局詭譎多變和第二次石油危機衝擊的七〇年代，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前，教育、思想、文化各方面無不籠罩在「大中國」主義和泛政治化的氛圍。尤其，戰後面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巨變的歷史脈絡，「公民」概念如何被定義？學校教育如何形塑、建構「公民」意識？公民教育內涵為何？有何轉變？轉變的機制為何？這些問題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具體而言，本文延續〈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I)〉的討論架構，以教育措施、課程與教學活動及教育成效三方面，分析二戰後至國府遷都台北之間的轉換期，教育體制如何傳遞國家意識形態，培養效忠國家民族的「公民」。茲討論如後。

##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轉換期（1945–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簽署《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陳儀代表同盟國接受在臺日軍投降。將近兩個月期間，台灣既不屬於日方治理，又無中華民國接管，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因而由臺日裔人士以原日治時期制度維持社會運作。國民政府接管後，基於台灣地處海外邊陲且長期受日本殖民的特殊情況，設立不同於中國省級行政體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sup>2</sup>沿襲台灣總督府的制度措施。國民政府任命陳儀出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掌握軍事與行政大權於一身，甚至比日本殖民的台灣總督權限還大，而備受爭議。

由於台灣受日本殖民推動現代化的影響，在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發展已有一定水準。然而，戰後來台接收人士未必能掌握隔閡五十年之久的台灣社會變動實況，導致對台灣的錯誤認知，而有「古色蒼茫的台灣觀」之譏；<sup>3</sup>甚至以勝者、統治者的姿態，看待台灣人為日本「奴化」的「化

2 有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組織之討論，詳見簡筌簧（1995：252–256）。

3 請參見陳三井等人對於二二八事件訪談的口述歷史（1991：219）。

外之民」。<sup>4</sup>戰後的台灣人民面對政權轉移，國族身分認同的確定，遭受的歧視和差別待遇，似乎更勝於日本的異族統治。尤其，政府部門多由外省人壟斷，台人僅擔任低階職位，官員水準不齊，貪污腐敗、不守法等劣行層出不窮，招致台灣人的反感與蔑視，官民對立日益激化。此外，為使「工商不停頓」，政府延續日本殖民時期的統制經濟政策，接收日人在台產業及私有財產歸為公有，繼續實施專賣制，並成立台灣省貿易公司，幾乎完全掌控經濟命脈，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然而，戰後物資不足，公營事業弊端百出，加上國共內戰，物資供需失調，物價暴漲、失業嚴重。本為糧食出口地的台灣，1947年初竟然發生米荒問題，招致民怨沸騰。

累積一年多對政府措施導致民不聊生的龐大民怨，終因查緝私菸處理失當，傷及無辜民眾，引發群情激憤，進而爆發各地大規模反政府的軍民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行政長官陳儀以台灣人「有組織叛亂行為」等理由，向中央政府請求增兵鎮壓，展開掃蕩行動，並進行全島性的清鄉工作，也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廢除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屆省主席，縮小公營事業範圍。1949年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基於國防安全需要，5月20日宣佈全省戒嚴，實施《台灣省戒嚴令》，逐步建立國家一體的威權體制，直至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由於國共內戰形勢逆轉，超過100萬軍公教、學生和家屬自大陸撤退到台灣，1949年12月7日中央政府播遷至台北市，此後，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僅存的實質主權統治範圍。

可以想見，台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這段短短四年間，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巨觀層面，或是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互動溝通和語言習俗等微觀層次，都產生極大的轉變，加以戰後隨即爆發的國共內戰，更增添局勢和人心的動盪不安。從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的觀點來看，如何消除日本殖民的影響，重新建立對中國的認同，並穩定台灣社會發展，讓「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這些皆是最重要的任務。二二八事件過後，將事因歸咎於「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更加強國民政府徹底掃除日本

4 黃秀政等著（2002：251）。類似說法頗多，不一一贅述。

殖民教育，積極推動「中國化」教育的正當性。<sup>5</sup>然而，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到底是重回「母國」的懷抱，還是受到另一種「殖民」統治？在戒嚴高壓的「白色恐怖」氛圍下，這樣的質疑只能深深埋藏在心中，成為不能觸碰的「禁忌」。

## 一、教育措施

1895年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長達五十年之久的殖民時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內地延長」、「內部殖民」的實施地，日本藉由「同化」的教育制度培養台灣人成為「皇民化」的次等國民。在殖民後期，接受日本現代國民教育的台灣年輕人，不乏認同、想像自己是日本國民，為效忠天皇而投入戰場。可想而知，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面臨的首要工作，就是消除日本殖民思想的影響，積極推行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以使台灣人心向祖國，培養對中國認同的「公民」教育。因此，戰後四年的台灣教育是以「祖國化」為指導方針，也就是以「中國化」為推動與改革教育制度的準則。1949年後，隨著國共內戰政局丕變，台灣教育不僅強化「中國化」之推行，更增加「反共」的內涵。

### （一）教育政策方面

1945年3月國民政府即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在綱要中揭示施政的首要目標，為「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對於學校制度改革、課程教材革新、師資更替及國語推動，均列為首要施政工作。<sup>6</sup>台灣教育「中國化」的具體措施包括：教科書使用國定本或審定本，推行國語運動等。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行政長官公署的教育政策，即以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和三民主義教育為指導原則，致力於推行國語，培養民族文化，清除日本文化，並增進教育機會均等。也就是，一方面加強推行中國語文，以取代日語；一方面宣揚三民主義去除日本殖民思想，使台灣人民重新認識中華

5 本文所稱的「中國化」教育，是指戰後初期四年台灣從日本殖民轉向中國的教育體制。當時中國大陸的教育方針即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但因戰亂頻仍，教育並未普及；戰後政府接管台灣，以去除日本殖民教育的影響為首要，以「中國化」為教育措施和教育改革的依據。1949年政府遷台後，在「中國化」教育之外，更增強「反共復國」內涵；之後實施《台灣省戒嚴令》逐步建立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歷經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管制人民的言論思想，並藉普及化的國民教育灌輸黨國意識，以致有「黨化教育」的批評。

6 詳細討論可參考秦孝義、張瑞成（1990：109-115）。

文化，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1947年省政府教育廳接管教育事務，持續中國化教育的目標，並尋求質與量的改善，力求學生「安心讀書」、「教育絕對安定」。主要教育工作重點包括：加強師資培育與訓練，以提高師資水準；加強推行國語，舉辦中國文物展覽，以增強中國化教育；改善學校設施與教材，提升學生受教品質。1949年陳誠來台主持省政，為國民政府撤守台灣預作準備，同時也為解決大陸軍民陸續來台造成學生人數激增的問題；強調實施「計劃教育」，<sup>7</sup>藉由學校數量之增加、教學設施之加強及升學就業輔導等措施，解決學齡兒童就學、學生升學和就業問題，以配合實際政治需求，奠定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反共的基地。

## （二）教育制度方面

接收初期相關教育措施由行政長官公署下設教育處統籌，依照「學校不停課」的原則，一面進行教育接收，一面推展各項教育改造工作。教育處參酌中國省制規劃行政組織，並以中國所施行的「六三三」學制為藍本，採學年學期制，廢除日本殖民對台日學生隔離的差別待遇，提倡教育機會均等原則。規劃、調整各級學校制度，初等教育一律更名與改設為「國民學校」，並增設、擴充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類別及機構，學生升學管道不再受到限制，有效提高學生升學率。為加強中國化教育政策之推動，特別設置不同於中國各省的委員會。例如：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特重編輯適合台灣中小學教材，尤其文史科目，以加強中國文化內容；國語推行委員會則致力推行中國語文。二二八事件過後，教育處改設教育廳，並擴大組織、增設各種委員會，除延續推動國語普及的工作外，參考日本殖民的教育措施注重衛生教育，並重視教育與生產建設之配合，加強師資訓練，以健全各級學校教育。一方面，力求安定避免受國共內戰波及；另一方面，藉由教育促使台灣早日中國化。

由上述可知，戰後台灣推動的「中國化」教育措施，主要藉由教育政策與制度的中國化，消除日本殖民時期實施差別待遇的教育不平等，並以中華文化扭轉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的影響，增強對中國的認同，以培養中華民國國民精

7 計劃教育之實施，請參考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49：7-29）。

神。具體來說，為消除日本殖民的影響，讓台灣人心向祖國，最核心的工作莫過於廢除日語，加強推行國語。因此，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如同日本殖民時期全面推動日語學習的政策，立即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於 1946 年訂頒台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全力展開國語運動，並以大中國意識，做為教育的主軸。教育處規定各級學校一律教授國語及語體文。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並禁止台籍作家用日文寫作。二二八事件後，各級學校禁用日語，日常用語盡量以國語交談，更全面禁講日語，禁用日語唱片。1948 年國語推行委員會訂定台灣省各縣市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從省政府到地方縣市得以更有組織、有系統地貫徹執行國語推動工作。然而，全面推行國語，禁絕日語，卻連帶打壓台灣既有的本土文化，讓不少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不僅因政權轉移影響語言溝通所造成的「失語」，更因涉及生存能力、身分認同及心靈禁錮所導致的「失語」，而埋下近年台灣族群衝突、省籍矛盾的社會分化與對立。

## 二、課程與教學活動

為確保臺灣從日本殖民地轉向中國，除藉由教育措施的「中國化」，從制度結構面消除日本同化教育對台灣的影響之外，如何傳遞中華文化思想與民族精神，培養中華民國國民，自然成為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的首要任務。

### （一）學校課程方面

有鑑於戰爭末期臺灣經歷皇民化運動與軍事動員的巔峰，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認為台灣嚴重缺乏中國國家和民族文化，甚至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影響國族認同。因此，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依據台灣特殊情況，實行台灣地區的「暫行課程」，通令各級學校廢除修身、日語、日本歷史、日本地理、武道等課程，改授三民主義、公民、<sup>8</sup>國語、國文、本國歷史、本國地理等科目。對於數學、自然等有關技術學科，雖可以繼續講授，但須注意教材內容，以符合中國化之教育目標。<sup>9</sup>也就是，消除日本殖民的皇民意識，藉由中國文史及

8 實際上，在清末民初學校課程即有「修身」一科，民國建立到 1920 年代，配合學制改革的中學課程才有「公民」科出現。

9 各級學校課程資料，可參考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29）。

公民科目之加強，教學時數之增加，尤其重視「國語」的推廣，以傳遞大中國意識形態，讓學生儘速「中國化」，成為具有中華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國民。

「暫行課程」僅實施一學期，隨即改採 1942 年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並於 1946 年八月起實施，後又隨 1948 年部訂課程標準修訂而更動，務使台灣與大陸教育內容相符，學生程度趨於一致。此舉係以加強台灣學生認識中國文化為優先考量，然而，以中國對日抗戰兵馬倥傯及戰後局勢的混亂，教育普及程度未必優於台灣，卻依據教育部所訂的全國課程標準一體適用於台灣，而未能審慎規劃，顯然失之草率。一方面，未顧及當時台灣歷經政權轉換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衝擊，以及民眾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化」的優越感而鄙視日本「奴化」的台灣，卻未考量台灣本是原民和漢人混雜，加上日本殖民影響的特殊性。實際上，所謂依台灣特殊需要的「暫行課程」，係以「中國化」為主，將課程科目、教材與時間加以調整，增加國語和文史科目的學習。教育處編輯的「暫用」國語、歷史課本僅一學期，隨後續編的文史教材則多參考中國大陸教科書，不僅輕忽台灣學生掌握國語文的困難，更無視學生對台灣周遭環境學習的需求，以及日本統治五十年與中國分隔、斷裂的歷史事實和衍生的複雜情感。此外，教師員額不足、素質不佳，許多教師夾雜各省口音的國語，卻嚴厲取締「台語」要求學生講「標準國語」的不當。簡言之，為加速台灣學生「中國化」，課程教材調整、更替，無可避免「便宜行事」的作法，卻未能顧及課程變動之妥適性以及學生實際需求，造成不利台灣學生的學習。

## （二）教學活動方面

教科書可說是教學活動的指引，從各科教科書選用、內容分析可知學校實際教學活動的梗概。1946 年教育處尚未供應學校教科書之前，各校教學多以算數、體育活動因應，或自行選用昔日書房的漢文教材，亦不乏以閩南語教授，學校教學活動較無明確規範。之後，基於「中國化」的教育政策，設立「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審定學校教學活動教材。尤其，重視國語、歷史、地理、常識等科目教科書的重新編輯，以培養國家民族意識。1947 年省教育廳成立後，加強推動義務教育，以提高就學率，教科書改採全



國一致的國定本，並免費供應國民學校學生使用。由此可知，政府透過免費提供統一教科書，不僅各國民學校實施各科的教學活動漸趨一致，更藉由國語和文史科目去除日本殖民色彩，加強對中國的認識，降低台灣與大陸的歧異，促進學生對中國的認同。

從教科書內容來看，初期教育處所編的「國語」教科書，有關國家民族及中日關係歷史的內容多達一半以上，特別注重「國家意識」與「國民道德」。包括：有關國家、國旗、國父與孔孟事蹟的教材；教導學生敬重有功於國家的軍人；加強對中國認同的敘述，如「遊覽大上海的景色，…領略新中國復興建設的氣象」。教科書統一後，各冊國語課本均強調國家民族意識，少有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教材內容遠離學生的生活經驗，遣詞用字過於艱深；而未能從語言學習的觀點，考慮台灣學生的國語文程度，降低教材難度、減少學習分量，以提供循序漸進學習的機會。甚至，課文生字多未加註注音符號，加上教師本身發音並非標準，不少學生讀音錯誤，或以「日語」旁注讀音多無法掌握正確發音，而有「南腔北調」無法溝通的亂象。可以想見，國語教學實際的困擾和問題。

文史科目的教學活動也是以傳遞中國文化思想，培育民族精神為主要內容。例如，國民學校暫用「歷史」教科書編輯主旨，「排除歷來日本的謬誤宣傳，使學生認識祖國，瞭解世界現勢，而以激發民族意識，引導學生有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志願與信心為中心。」因此，歷史教材多以灌輸國族意識為主，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七國恥」等中國歷史的內容。雖然，教科書編輯大意揭示，「為求適合本省兒童之生活環境計，對本省鄉土教材，酌量加入」，但實際上，歷史教科書只有「台灣的開發」、「台灣的抗戰」份量極少的教學單元，不僅無法從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也欠缺以台灣歷史來理解台灣與中國的關聯性，進而產生對中國的認同。

此外，有感於日本殖民國間總督府厲行日語教育對台灣「皇民化」的影響，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首要政策就是消除日語，推行國語。因此，特別成立推行國語的專責機構，致力推動社會教育和各級學校，期在最短時間完成「以中

國的國語取代日語」，作為台灣推動中國化教育的基礎。除了藉國語和文史科目傳遞中國文化和民族精神外，為發揮語言的社會、文化功能，各縣市舉辦「國語運動週」，辦理作文、演講、朗讀、寫字等各項國語文競賽，各級學校除增加國語文正式授課時數，並配合舉辦各項語文研習和競賽活動，藉由學校帶動家庭和社會全面推動國語運動。1948年，國語推行委員會創立「國語日報」，作為學生學習國語之補充讀物，行銷全省各校，直至今日仍有相當高的訂閱數量。

戰後台灣積極推動國語教育，以取代日語，奠定中國化教育基礎，但是，許多教師不僅欠缺國語教學經驗，且來自各省的教師也未必能以標準國語講授。為解決師資嚴重不足及推行國語教學的困難，教育行政當局從國語師資培訓、廣播讀音示範及教材教法實驗等措施，提升國語教師程度。具體方式主要有：舉辦講習會培訓國語教師，並專為國語教學招聘國語教員以及國語指導員輔導各縣市國語教學；辦理各縣市國民學校教員國語講習班，要求教師接受國語研習訓練；設立語文補習學校，開辦教師進修班，以提升教師語文程度。為儘速補救國語師資之缺乏，並樹立讀音標準，教育行政當局特在廣播電台開設「讀音示範」節目；灌製注音符號讀音示範留聲片，並免費分發全省各偏遠地區，廣為宣導推廣。此外，為加強各校教師和學生的國語正音，教育處利用廣播逐課範讀國語課本，並固定解答相關問題；並於1948年將歷史課本加入選播，協助教師正確講授教學內容。經由教育政策引導，各校皆重視國語教育推動成效，成為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成功關鍵。

學校教師的良窳直接影響教育成效，為達成推動中國化教育之目標，教育行政機關一方面加強國語師資的徵調與培訓，透過短期訓練、在職進修及檢定等方式，儘快增補教師員額；另一方面注重師範學校之改革與擴充師範學校數量，以增加師資員額，培育「中國化」師資。以國民教育師資為例，師範學校從日治時期的專上程度調整為中學，以儘速培養所需師資。課程內容除教育科目外，特別注重國語文、三民主義與國家思想教育；並沿襲日治時期對師範生採取軍事化生活的管理模式，透過集體住宿、內務整潔、勞動服務、軍事教育訓練，並實施早晚點名與自習等一致的生活作息，培養具有國家意識、軍國民

思想和集體紀律的教師，成為推動中國化教育的主力。簡言之，戰後國民學校師資培訓，短期訓練多以國語文訓練、中國歷史和民族精神的內容為主；師範學校則是主要師資培育機構，極重視國語文課程，畢業生必須通過國語文統一測驗，並加強國族精神、學科、生活及專業訓練，培養效忠國家、獻身教育的教師。因此，師範教育被視為精神國防，是推動中國化教育的核心。

綜上所述，台灣在戰後四年藉由教育政策與制度的中國化，建構「中國化」的教育系統，透過精神國防式的師範學校，培養效忠國家的教師，以實際推動中國化教育，傳遞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為消除日本殖民的皇民意識，確保臺灣人對中國的認同，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特別重視國語文、歷史及三民主義等科目，增加教學時數，辦理各項「國語」推廣活動，以培養具有中華文化思想與國族精神的中華民國國民。總而言之，戰後因政權交替轉換，台灣從效忠日本的「皇民化」教育，轉為效忠中華民國的「中國化」教育。

### 三、教育成效評估

過去這段戰後歷史多不為人知，近年則隨著二二八禁忌的解除、史料的陸續揭露，引發許多學術的研究與討論。有趣的是，海峽兩岸統獨立場各異，各有不同的歷史詮釋。中國大陸反而較為肯定當年國民政府在台灣推動的「中國化」教育，承繼中華文化的傳統，台灣的研究則多以「中國化」壓抑台灣本土化的發展，忽視台灣主體性的「殖民」統治。這些不同的評價，再次突顯時空差異、國家政權轉變的「物換星移」，而不免「以今論古」的偏頗、政治立場和意識型態的影響。

#### （一）中國化教育之省思

從教育體制而言，總督府在台灣的教育設施是日本殖民主義的觀點，「皇民化」教育目的是培養效忠殖民母國的「次等」國民，教育體制是異於日本「皇民」的差別待遇。戰後國民政府在台灣推動中國化的教育制度，初期在行政長官總署下設教育處，並設立各種專責的特殊委員會，以提升教育行政位階，發揮組織功能，不僅非日本殖民時期附屬民政單位可比擬，也比當時中國其他省分的組織規模更為擴大，增進台灣教育改革「中國化」政策的推動

力，奠定台灣成為實行三民主義的「反共保壘」。學校系統也依據中國所行的「六三三四」制，<sup>10</sup> 調整日本殖民時期的學制，廢除以台日種族、日語家庭作為入學區分的差別待遇，達到「廢除不平等限制，增加教育機會」的目標。例如，國民學校不再以身分隔離，所有學生受教機會一律均等，實施六年義務教育居中國各地之首，學齡兒童就學率接近 80%；廢除原國民學校的高等科，初級中學的設置，提升國民學校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然而，由於國共戰亂及台灣社會局勢不穩，在經費、資源及人力不足的條件下，未必能貫徹既定的教育政策，影響地方教育行政和學校教育的實際成效。此外，升學限制雖解除，卻因普通中學與職業學校數量、教學品質的差距，無法滿足學生、家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需求，形成「升學主義」的競爭壓力，更強化學校課程與教材的「中國化」，以及學校強調集體紀律和威權管理的正當性，妨礙學生各項潛能的探索與發展、學校教育功能的發揮。

課程教學方面，以「加強中國文化」為目標，廢除日本「皇民化」的學校課程，並遵循中國的課程標準，對各級學校課程進行大幅調整，尤其國民教育階段，特別重視國語、公民、中國史地等科目，增加教學時數，重新編輯教材，加速對中國的認識，促進學生對中國的認同。教育當局特別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專責機構，大力推動「國語」，視為「中國化」教育的指標。1948 年教育部長朱家驊視察台灣教育，即讚許各級學校員生都能說國語，尤其小學生說的國語，比大陸各省程度高出許多。<sup>11</sup> 然而，受制於時間有限，為追求速效，不免倉促行事，導致執行偏差。例如，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多能體認語言的文化功能，雖主張推行國語「不必」也「不能」把方言消滅，<sup>12</sup> 卻不敵大中國思想、國族主義的政治正確，電台廣播、公務機關紛紛禁止使用台灣話，學校甚至以嚴厲處罰方式禁絕方言。<sup>13</sup> 同時，學校教學內容多強調中華文化、國族意識，

10 當時中國所行的「六三三四」制是指小學六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及大學四年的學校制度，係 1922 年教育部參考美國學制所實施的新學制。

11 朱家驊部長視察台灣教育之觀感，詳參王聿均、孫斌（1977：216）。

12 有關推動國語與保存方言的爭議，可參考方師鐸（1965：133）。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自 1946 年 5 月 21 日在《台灣新生報》開闢「國語」專刊，每逢週二多有專家、學者討論相關議題，批評「放任台灣方言自生自滅」的不當觀念。

13 許多人都有「說台語被罰錢」，或是脖子掛「說台語」牌子，公開羞辱的不堪回憶與噩夢。

既忽視台灣既有的文化和風土民情，亦未能考慮學生的生活經驗，欠缺從學生自身經驗出發，逐步擴展到社會、國家的連結。因此，「中國化」教育致力於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卻也壓抑了台灣本土文化原屬於中國的部分，例如台灣原有的閩南、客家文化，以及日本殖民期間在台灣所發展出的和漢混雜的特色（如台式日語），都因此受到壓抑。「中國」可能只是遙遠、抽象的想像，如何形塑台灣人「生命共同體」的認同？無怪乎，面對政權轉移所帶來的動盪巨變，有些人對於「日本」、「中國」或「台灣」不同身分的游移與 確定，在認同與抗拒之間的拉鋸擺盪。甚至，認為「中國化」所招致的歧視和差別對待，似乎更勝於日本的異族統治，產生認同的矛盾與衝突。

實際上，不僅是學校的正式課程與教學，學校環境、生活作息與管理及各種集會、活動皆為達成「中國化」教育，培養國族意識的「公民」教育。例如，國旗國歌、升降旗儀式等國家的象徵；操場中央聳立的司令台、強健體魄養成的體育活動及軍訓課，隱含富國強兵、強國強身的軍國民教育思想。<sup>14</sup> 尤其軍訓課程，不僅內涵軍國民教育，在戒嚴時期更是黨國教育的具體實踐。學生在校行為規範如同軍隊「命令服從」的權威管制，從服裝儀容到言談舉止，甚至，校外交友、課外活動和聚會，鉅細靡遺、無所不包。藉由對學生身體與心靈的「規訓」（discipline）與「監控」（surveillance），動員到政治和軍事的反共大業。「中國化」教育以傳遞大中國思想、國族意識為主，如此，教育僅是灌輸文化一元論（monism）、單一價值或生活方式的箝制工具，而無法達成教育使人自由探索、發展潛能的啟蒙與解放。

## （二）公民教育的變與不變

戰後的台灣，脫離了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的統治，從國民政府的角度來看，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無異是抗戰雪恥、民族戰爭的歷史勝利，自然認為台灣長期接受日本「奴化」教育，明顯缺乏中國國家性和民族性，亟需推行「中國化」的教育，建立對中國的認同。尤其，二二八事件過後，政府更加

14 軍國民教育可以說是源自日本殖民後期，因應二戰需求訓練戰場作戰的國民；也可溯及清光緒 28 年（1902）當時提倡的軍國民教育，以及民國初年注重強健體魄、尚武訓練課程的軍國民教育。簡言之，軍國民教育是在民族主義影響下，強調「強國強種」、國富民強的思想，培育軍人與國民兼具的軍國民。

強掃除「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推行國語、禁絕日語，顯示中國對日抗戰所累積的仇日心態，以及推動中國化教育的正當性。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成為「反共復國的基地」，教育措施以闡揚三民主義、加強心理建設、發揚民族精神，培養民族文化為重要方針；各級學校全面推動國語、禁說方言，課程與教材充滿大中國意識，強調忠黨愛國、效忠領袖和反共思想的教育。換言之，國民政府所定義的「公民」，是具有三民主義思想、國家和民族意識的中華民國國民。「公民教育」的內涵並非僅限於「公民」單一科目的教學，而是藉由教育行政組織與政策、學校課程與教學活動、師資培育及國語運動，以「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全面推動「中國化」教育，培育效忠國家民族的「公民」。

實際上，早期台灣的教育大多是私人辦學，並無凝聚「台灣」意識的社會功能，也談不上培養參與公眾事務的「公民」。直到日本殖民統治，才開啟台灣現代的學校教育制度，培養兼具皇民化與現代化的國民；戰後國民政府全面推動「中國化」教育，則強調去除日本殖民色彩，建立台灣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台灣歷經日本統治到國民政府的政權轉移，教育措施隨之改變革新，以「中國化」取代「皇民化」。公民教育關乎人民對國家、社會的認同意識，所以，即使戰後台灣政經局勢混亂，社會動盪不安，政府仍堅持「學校不停課」的原則，進行教育體制革新，推動中國化教育。由此可知，教育被視為傳遞國家意識型態的機器，國家、政治權力的競逐是「公民」教育轉變的重要機制，而欠缺為「教育而教育」的獨立性、以人為主體的教育觀。

看似翻天覆地的巨變，其實，無論「皇民化」或「中國化」都是由國家掌控的教育體系，強調富國強兵的軍國民思想，培養具有國族意識的國民。兩者皆是在西方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發展的脈絡下，主張教育肩負民族凝聚、國家興亡的重任，應由國家介入而不能放任私人辦理。在國家主義影響下，國族概念是以單一、強勢民族為主，國家權力透過各種方式，保有其法理與穩固的統治地位及社會穩定運作，卻忽視同一國家、社會有不同族群和文化的組成，或刻意以主流、優勢文化打壓其他文化的發展空間。「公民」教育的定位，是由國家而非私人來培育公民，教育被視為傳遞或建構國族意象、國家認同和意識型

態的重要機制。換言之，日本殖民的「皇民化」與國民政府的「中國化」有其共同一致性，都是高舉國族主義旗幟，國家掌控教育系統，藉由普及化的國民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及全面推動國家語言，透過制度化的機制形塑國家認同和國族意識，以培育符合國家定義的「公民」。這就是從「皇民化」到「中國化」的轉變中，「公民」教育不變的內涵。

## 結語

歷史常被埋沒在荒煙漫草堆，尤其在兵荒馬亂、動盪不安的「改朝換代」之際。台灣戰後四年期間，正是日本戰敗交由國民政府接管，政權轉移、青黃不接的空窗期。若以教育「百年」大業來看，這段短暫歷史可能少有建樹可談，也可能不值一顧。但是，如果追溯近年課綱的爭議，有關「去中國化」、「本土化」和「台灣意識」的論辯，戰後這段「學校不停課」，消除日本殖民影響，推動「中國化」教育的歷程，或許是理解台灣公民教育轉變的關鍵。

從日本殖民的「皇民化」到國民政府的「中國化」，雖迥然不同，卻都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由國家掌控教育，強調國家認同和社會整合的「公民」教育。透過學校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尤其重視統一的國語、國家形成的歷史、國土範圍的地理、國家定義的「公民」與「道德」等科目，以及各式各樣的團體活動，培育效忠國家的理想公民。二二八事件後更加強推動「中國化」教育，強化國家認同。1949年台灣地區宣布戒嚴，逐步建立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其後歷經五、六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嚴格管控、箝制言論思想，全面推動以三民主義為教育方針的「黨化教育」，藉由教育強制統合，以中華文化為法統基礎，培養服從、效忠國家的「公民」。<sup>15</sup>由此看來，這段時期的教育似乎只是傳遞國家意識形態的機器，教師也只是忠實的執行者。

雖然，人類無法逃離意識型態，卻能從批判中找尋出路。戰後的台灣，有禁聲、失語的心靈禁錮；卻也有「壓不扁的玫瑰」依然綻放。學校可能是「共犯結構」，卻不能忽視教育對人心靈的啟蒙與解放，也是公民教育不斷轉變的

15 下篇文章將再詳細討論 1949 年之後台灣戒嚴時期的「黨化教育」，以及在民主化、全球化的衝擊下，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

動力。誰是「公民」？如何形塑「公民」意識？答案並非飄盪在風中，而是在時空脈絡的具體展現。

## 參考書目

- 王育德。1999（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草根出版社。
- 王聿均、孫斌。1977。《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方師鐸。1965。《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台北：國語日報社。
- 史明。1998（1962）。《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文化出版社。
- 田培林。1987。《教育與文化（上）、（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台灣省行政長官教育處編印。1946。《台灣省教育概況》。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49。〈計劃教育實施〉，《台灣省政紀要》。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55。《十年來的台灣教育》。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 汪知亭。1978。《台灣教育史料新編》。台北：商務書局。
- 何清欽。1980。《光復初期的台灣教育》。高雄：復文書局。
- 李汝和主編。1971。《台灣省通志》，卷五教育志，教育設施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李園會。1983。《日據時期台灣之初等教育》。高雄：復文書局。
- 林玉體。2003。《台灣教育史》。台北：文景書局印行。
- 徐南號。1996。《台灣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
- 高明士。2006。《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1991。〈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2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文團。1999。《意識型態教育的貧困》。台北：師大書苑。
- 秦孝儀、張瑞成。1990。《光復台灣之籌畫與受降接收》。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 黃秀政等。2002。《台灣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黃俊傑。2006。《戰後台灣的轉型及其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黃俊傑。2005。《光復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張博宇。1974。《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湯梅英。2014。〈台灣公民教育的轉變歷程：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挑戰（I）〉。《台灣人權學刊》2（3）：19-30。
- 葉憲峻。1993。〈二次世界戰後初期台灣之中國化教育——以初等教育為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彭煥勝等。2009。《台灣教育史》。高雄：麗文。

簡筌簧。1995。〈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組織之探討〉。收錄於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252-256。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Green, A. 1990.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London: Macmilla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aiwan (II): Changes and Challenges after World War II (1945-1949)

Mei-Ying T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ries project on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project is how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shaped and reshaped in a changing society amid the tensions of nationalism,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school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same framework as that of the first article which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education for colonized citizen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there were too many policy changes, reforms and reversals, occurring within the first four years (1945-1949). Nothing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diminishing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on Taiwan. The utmost goal of education was to cultivate future citizen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s Chinese citizens through a sinicized education system and school curriculum. There were mandatory subjects such as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Sun Yat-sun, and Civics with the indoctrination by patriotism and ethno-Chinese nationalism. In short, schools were pivotal in maintaining the party-state in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Civic education served the ideological needs of the regime, preserved the power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supporte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atriotism.

## Keywords

civic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sinicization of education

---